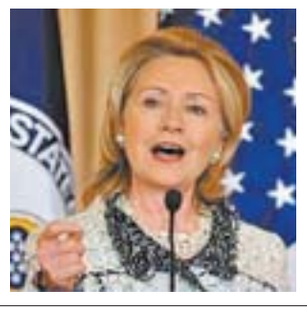
■ 新闻关注

奥巴马本周将公布控枪对策

美国总统奥巴马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副总统拜登已向他提交了控枪对策建议，他本周将把这一控枪对策公诸于众。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下令24小时内逮捕总理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指控阿什拉夫此前在担任水电部长期间，在巴国内能源项目上存在收受回扣和佣金的腐败行为，并下令政府在24小时内逮捕阿什拉夫。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视神经或遭“灾难性的损害”

美国一杂志惊爆：在先后遭遇了胃病、脑震荡、脑血栓一连串严重健康问题后，现年65岁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头部的血栓可能会对她的视神经造成“灾难性的损害”。

印度千万全裸朝圣者跃入恒河庆大壶节

印度“大壶节”又称为“圣水沐浴节”，是世界上参加人数最多的节日之一。节日期间，千万全裸印度教徒当天追随神职人员在恒河沐浴，以清洗旧日罪孽。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相比对知识分子范围的界定，今天另一现象更值得关注：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公众视野内面临垮台危机。

梁文道：反思网络中的知识分子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光头，黑西装，白衬衫，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梁文道的装束黑白分明，一如他的表达，明确清晰，逻辑环环相扣，精确瞄准听众的注意力。

1月9日，北京环球贸易中心五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理想国”文化沙龙上，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三位特色鲜明的70后写作者，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以“云知道”组合亮相。

“‘云知道’很像一个乐团组合的名字。我们会去不同的地方演讲，做沙龙座谈。我们希望是一个系列的主题贯穿下去。今年的主题是——知识分子。”梁文道说。

知识分子不囿于职业

梁文道从讲台上走下来，被一群读者围住在新书《味道》上签名。主办方工作人员隔着人群叫：“梁先生，过来坐下签。”他摆摆手拒绝。面对读者，梁文道保持着恭敬的面孔。他签书，不像有的作家只顾埋头划拉，而是一定要望向读者，双手递回，道一声“谢谢”。

在大多数场合，梁文道不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主动把自己划为“知道分子”的行列。他出版最为知名的时评作品集《常识》，以浅白流畅的语言，冷静道破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一面。1970年出生于香港，少年成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内地公众对他的了解始于凤凰卫视，他是电视台主持人、嘉宾，同时在南方周末撰写专栏。

1月12日，“云知道”把沙龙开进北京大学。参与者大部分是学生，现场座位不够，不少人席地而坐。梁文道分享了有关知识分子与公共性的看法。

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来的热词。梁文道赞同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一位社会学家的观点，对知识分子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靠思想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为思想而活。

知识分子一旦与公共性相联系，便不再囿于专业和职业。梁文道举例，公共知识分子最好的例子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后期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战争期间有大量关于政治的看法。

“从很严格的政治学的角度看，他的很多政治看法其实并不专业，甚至可以说是幼稚，但大家仍然会倾听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爱因斯坦。人们或许可以不同意他说的话，但你不能否认他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始终应该保有一种业余者的疏离状态，保有你在行业以外、职业以外对某种事物的爱好。而这种爱好是可以很深的。”

“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来自很多职业。”梁文道说。关注空气污染的公交司机，关心公车私用现象的中学生，都有可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或者在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之外有关怀，要有超出束缚的欲望。大家在公共范围发声，关怀社会，影响周围的人就是知识分子。

“污名”下的社会心理脉络

2010年，方舟子和梁文道之间曾有一轮骂战风波。今天，梁文道试着以客观的姿态提到对方：“方舟子你别装了，你也是公共知识分子。”

相比于对知识分子范围的界定，今天另一现象更值得关注：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公众视野内面临垮台危机。如今网络上常常见到，随便一个公共话题，便会引发网民对“公知”、“母知”的围攻。在网络语境中，“公知”直接变形成为贬义词。

许知远感慨于网络上价值观的一再颠覆。梁文道对“知识分子污名化”背后隐藏的社会脉络作了分析。

有一个词，很多年前大家认为是褒义词，现在网络环境中也被认为是负面词——精英。为什么现在大家把这个词看作是一种反讽，都在骂精英？从具体的社会环境来看，今天被指作精英的人，或许是某些贪官，或许是某些富商，在各大会所开着名车出入，叼着雪茄举着红酒晃啊晃的。在公众眼中，这些人是一群既得利益者。

“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很大，大家开始意识到，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分配有不公正之处。正是因为某种扭曲和不公正，使得某些人成为经济上获利最多的人、以及政治上获得利益最多的人。他们构成了精英群体。”梁文道指出，权力寻租带来扭曲和不公正。人们看到，发财的商人第一桶金，往往是黑的；国家发展到今天，重大的环境污染也是他们在开发过程中所应该承担的。于是公众得出结论：精英很坏很黑。

以此为脉络展开，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提出的观点和说法有时为精英群体代言，被公众抓住把柄，换来污名。还牵扯到很多著名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不少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被认为和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一脉相承，一起被泼上脏水。

这种社会心理走向并不复杂。让梁文道感到有趣的是，即便骂声一片，中国被骂精英的人甚至部分骂精英的人，往往并不反感被划入精英群体之中。

微博虽火却无真正讨论

“我不是要为‘公知’正名，不是要说公知多有良心，而是说随便地骂人不利于一个健康讨论的气氛和环境。”说完这话，梁文道感慨，这样一个呼吁恐怕改变不了什么。因为时代就是如此，这样的呼声注定微弱。他曾多次强调，如果真的是知识分子的话，就必须要关心讨论严肃的、有品质的问题。

近日微博不断爆出猛料，某些艳照官员和拥有多套房产的“房叔”、“房爷”浮出水面，网络监督发力，成为反腐的新生力量。但不难发现，这些事件的发生多有偶然因素，更多地流露出公众对私生活的猎奇心理，却并不触及问题的根本。

“过去十几年流行真人秀，我们忽然之间前所未有地对一个人的私生活、私人的性格感到无比有兴趣。你可以发现，这不只发生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有的民主国家选举总统，不再是有关政治立场的讨论，而变成这个总统有没有婚外情、有没有抽烟、他是什么人的讨论。”梁文道说。

梁文道认为，知识分子把精力转移到对这群人人格上的讨论，抹去了更重要的牵扯到整个国家的重大社会分歧的讨论。这样的严肃讨论其实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现在进入到大众舆论下，变成了政治讨论庸俗化的结果。西方国家的媒体政治讨论和政治生活越来越贫乏，政治的言语、论述越来越空洞，受到学者的批评。

“由于严肃的政治讨论很难在微博上展开，所以，大家更倾向于用一种很简洁、粗糙的语言来总结。不要说政治讨论，就连一般的交流在微博上也是很难的。”梁文道感觉，在中国，微博为主的舆论环境口水横飞，但问题或许更为严重。

梁文道本人并没有个人微博，但他会去微博上看看。他常常发现微博上对于他本人在某场演讲上的讲话，大部分都不太接近原意，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这样的微博发出去，被转发了很多次，有人看了微博就会下判断：没想到梁文道当时会这么讲，梁文道就是一个傻瓜。”

“如果我对一件事情感兴趣，我是一定要想办法找回他的原话是怎样的，他的整篇文章是怎样的。我很难根据别人的只言片语和别人的总结，去判断另一个人和另一件事。但是，今天大家大概都没有时间来做那么费神的事了。”梁文道说，微博上充斥了太多声音，但是缺少起码的判断基础。微博的速度那么快，大家上午关注伊能静，晚上在意李云迪，第二天又一起来关心南京“搓手猫”。

我们关心的事情每小时都在更新，随时作出的判断随时面临改变。但是真正的讨论又有多少？

应是只服膺于真理的人

“面对沟通如此迅速、联络如此紧密的方式，我在回避。”

与人们印象中的媒体人形象相反，梁文道在生活中给自己设置了信息屏障。他经常手机关机，短信隔上一两天才回复，邮件几乎每个月才回一次，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从不使用。除了一些社会活动，梁文道大多数时间在家读书，每天睡五个小时。

尽管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圈子”挂在嘴上，也喜欢把自己归类于各种不同的“圈子”，梁文道却有意与这种亲密接触的现实拉开距离，借此给自己更多反省的空间。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正在寻找。”他说。

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的脑海中似有勾画。“知识分子应只服膺于真理，而不是屈从于立场。”他向往南宋时朱熹和陆象山的那场论战，双方门下弟子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敌手，但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的辩论客气而节制。朱熹和陆象山私下跟弟子谈到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斯文，而是说，学者、知识分子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地下结论，而要对自己的观察判断有一个保留。”众所周知，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它不是那么容易就到达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该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们只敢说，或许我有一个想法是对的，拿出来讨论一下。这样的态度，是比较理想的知识分子社群内部讨论问题的态度。因为知识分子就应是一群只服膺于真理的人。”梁文道说。

■ 周末感言

关于水质信息

□ 张轶水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从今天(15日)开始，北京市将首次网上公布自来水水质信息，每季度第一个月的15日公布上一季度的水质信息……不管北京市的水是不是最好的，但北京市的水全部达标已经是公布的事实。相比于复杂的水质数据，市民看重的是直观感受。北京市民童先生说，他不相信水质达标的数据……王金生：这主要是碳酸钙等的沉淀，对人体没有什么影响。记者调查还发现，在北京的南城，“水质不好”几乎口口相传。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的孔女士说，南城的自来水一直都很浑浊。孔女士：南城的水一直就不好，很多人都喝桶装水、矿泉水，不喝自来水……马军：数据本身的质量也要能得到控制，审计非常重要。政府可以加强监管，另外也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比如在公共代表的监督制下开展审计共组，就可以让这些数据具备更高的公信力。公布水质信息是好事，不过，这只能算是第一步。公布的信息如何让民众信得过？是否应该公开更多监测信息？官方数据为何总与民众感受差得很远？这些都是没解决但需要解决的问题。(1月15日中国广播网——北京网上公布水质信息称全部达标遭市民质疑)

1月14日夜间，北京市首次网上公布自来水水质信息，数据显示全部达标；对此，包括童先生、孔女士在内，一些市民为什么“不相信水质达标的数据”？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次北京公布的自来水信息是真是假，而先来讨论一下其信息发布者的“公正性”。

有道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水质达标”的发布者为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这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其本质属性是企业，而企业的天性是逐利。假如自来水有些指标不合格，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愿意公布出来么？！

水质合不合格，自来水公司说了不算。据报道，目前我国仅有两三个城市自来水水质监测单位独立于水厂，而绝大多数的“自来水水质报告”是来自自来水厂的“自测”。问题正出在这个多年来的“自检自测”！众所周知，湘江的重金属污染严重，而湘潭本地相关部门对外宣称，从2008年至2010年，三家水厂水质达标率为91.98%。所以，一边是一些水厂水质不合格，一边是“自检合格”，也就见怪不怪了。

事实上，国家环保部《201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城市饮用水水源合格率为76.5%;2007年国家发改委等多部委对外宣称“全国近年抽检饮用水合格率83.4%”;2009年下半年，住建部水质中心作过一次全国普查，发现4000多家水厂中，1000家以上水厂水质不合格，且2009年以来，城市自来水水质并无“太多改善”。可是，在通信、新闻事业相当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消费者听说到底有哪家自来水厂水质检测不合格？

自来水质量问题，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正如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所言，要“加强政府监管，并且引入第三方”，唯其如此，才有“公正性”。

■ 齐鲁学人

陈增敬：金融波谲 数学为舟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宋艳丽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虽采取多项措施，却也未能将人们带离金融危机的阴霾。与此同时，一直低迷不振的股市令许多被“套牢”、“割肉”的股民焦躁不安，也让广大投资者信心难提。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金融衍生产品？金融风险是可以规避的吗？日前，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齐鲁证券金融研究院院长、数学院副院长陈增敬教授。

说到影响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产品时，陈增敬收住了笑容。“这次金融危机给世界许多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美国的经济根基却未被动摇。造成美国感冒，全球吃药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金融产品把危机转嫁给了其他国家，由全世界人们共同承担这一金融危机，这便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力量。市场经济本身存在危机，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通过期货、期权、股票、利率、汇率等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人民币衍生产品规避风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这就需要我们发明创造新的风险度量工具，描述金融衍生产品的运行规律，帮助金融机构检验、设计衍生产品、计算金融风险，规避金融危机。要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必须大力发展人民币衍生产品，一个经济强国首先应该是金融强国。”

谈到现在所从事的资产定价和金融风险度量的研究，陈增敬非常感谢导师彭实戈院士，正是1994年冬与彭实戈教授深入交谈，才转折了他已直驶了10年的高校人生轨迹。考取彭实戈教授的博士生后，陈增敬才明白何谓科研创新。他说，彭实戈院士有两个载入史册的贡献，一是发明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另一个是创立了非线性数学期望理论。我们就是通过学习彭实戈院士的理论，将非线性数学期望理论应用到金融实践领域，以更精确地刻画金融中的风险度量、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等问题。“之前，金融界一直将概率统计作为金融风险度量的工具。概率统计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四百年前人们创造的工具，人们至今仍然在用，那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别。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这些理论不够精确，不然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而非线性数学期望理论恰好能将市场的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

“由兴趣或应用驱动下的数学研究，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实我对数学感兴趣是研究金融之后，因为我终于发现了数学的用处。”陈增敬表示，数学是描述复杂现象的一种语言，它源于实践更应服务于实践。但是在数学教学中，老师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让学生感觉很枯燥。现在很多学生不喜欢数学，大概与我们的这种教育模式有关系。身为山大数学学院的副院长，他也在思考如何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凭借在数学及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陈增敬2003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4年入选“首届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并被教育部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1年，他与美国波士顿大学Larry Epstein教授合作的论文《连续时间下的模糊性、风险性和资产收益》，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数学教授。

■ 责任编辑 郭爱凤